

·敦煌文献研究·

现存最早的粘叶装书籍*

——敦煌遗书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装帧研究

方 广 铝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指出该遗书的装帧形式为现知最早的粘叶装,抄于 684—690 年间,形态成熟。提出中国书籍中的粘叶装,最迟在公元七世纪末已经出现。考虑到汉文书籍不少新的装帧形式大多出现在这一时期,指出由于初唐以来的社会安定、文化大发展,引发社会上文化学习普及,书籍需求量增大,加之外来佛教典籍装帧形式的影响,使得中国书籍装帧形态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关键词:《文心雕龙》斯 05478 粘叶装 书籍装帧

一、敦煌遗书《文心雕龙》简述

本文拟探讨敦煌遗书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装帧形式。在开展这一讨论之前,想先对敦煌遗书中所存《文心雕龙》写本的情况略作探讨。

关于敦煌遗书中所存《文心雕龙》写本的情况,据林其铨、陈凤金集校《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前言》汇总,除了众所周知的斯 05478 号外,还有如下两种说法:

(一)“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有‘近人黄文弼唐写残卷’的著录,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亦有‘前北京大学西北科学考察团员某藏唐写本,约长三尺’的记载”^①;

黄文弼(1893.4—1966.12),字仲良,湖北汉川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于1927年至1930年参加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图书馆藏汉文敦煌遗书总目录”(15ZDB034)、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成果之一。

① 林其铨、陈凤金集校:《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

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古、新疆考察活动。1934年至1937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上述两条资料所指,似谓黄文弼先生个人收藏唐写本《文心雕龙》一件。从“约长三尺”云云看,则该《文心雕龙》似为卷轴装。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件卷轴装《文心雕龙》。希望上述记载真实可靠,更希望该《文心雕龙》尚存天壤之间,并于将来的某一天面世。

(二)“上海图书馆已故馆长、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生前也称:曾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二日由张元济亲带一种黑底白字、楷书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残卷扣^①照片交其与《四部丛刊》本《文心雕龙》读校”^②。

这条材料提到的是某敦煌本《文心雕龙》残卷之反转照片,未涉及其装帧形态、长度与具体内容。材料中仅称该《文心雕龙》为“楷书”,则该写本之书法与斯05478号不合。因此,如果该记载可靠,它可能是传说中的黄文弼先生藏品,也可能是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另一种写本。总之,由于信息有限,我们目前难以对该写本做出进一步的推论。

下面介绍斯05478号。

该号为斯坦因敦煌探险所得,现存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编号为Or.8210s.5478。翟林奈《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将该号另编为7283号,著录文字为:“[*文心雕龙*]梁代(六世纪)刘勰著。第一(仅存末尾)至第十五(仅标题)。工整行书。纸张淡黄色,光滑,部分褪色。22叶小册子。17×12厘米。”

笔者曾在英国图书馆考察该写本,情况如下:

斯05478号,小册子,11.8×16.8厘米。首残尾残。由12纸依次粘接而成,12纸总长259.6厘米。所用纸张为打纸,厚薄均匀,厚度约0.1毫米。无帘纹。其制作方法为:将一张长约23.6厘米,高约16.8厘米的纸张对折,这样每纸成为两叶,呈现A、B、C、D等四个半叶。A、D两个半叶向外,B、C两个半叶向内。然后在每张纸的A、D折痕处抹上浆糊,与下一张用同样方法折迭的纸粘接起来。这样逐纸折迭、粘接,最终成为一册。现斯05478号首纸的A、B两个半叶残缺,末纸的C、D两个半叶残缺,故现存12纸共计22叶44个半叶。

该号有墨栏。中缝无书口。粘接面,每半叶抄写10行;不粘接面,每半叶抄写11行。共存462行,行21字左右。上边1.2厘米,下边1.2厘米,左边1.2厘米,右边1.2厘米。行宽0.95厘米。制作规整,抄写规整。现纸面有水渍。

该斯05478号《文心雕龙》的每纸数据如下:

- | | |
|-----------------------|-----------------------|
| 01:11.8, 11+10; | 02:23.6, 10+11+11+10; |
| 03:23.6, 10+11+11+10; | 04:23.6, 10+11+11+10; |
| 05:23.6, 10+11+11+10; | 06:23.6, 10+11+11+10; |
| 07:23.6, 10+11+11+10; | 08:23.6, 10+11+11+10; |

①方按:“扣”,原文如此,疑有错讹。

②林其铤、陈凤金集校:《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前言》,第8页。

09:23.6, 10+11+11+10; 10:23.6, 10+11+11+10;
11:23.6, 10+11+11+10; 12:11.8, 10+11.

上述数据,每个单元“:”前的数字是纸张的序号,“,”前的数字是该纸张的长度,“;”或“。”前的数字是该纸张每半叶抄写的行数,不同半叶行数用“+”区隔。因为首纸、末纸只剩两个半叶,故只著录两个行数;其余 10 纸均有 4 个半叶,故各著录 4 个行数。

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现存文字,从“原道第一”的“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到“谐讌第十五”篇题。

顺便一提的是,英国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斯 05479 号的包纸上,有朱笔苏州码子“932”,蓝铅笔阿拉伯数字“932”。还有蒋孝琬书写“杂录书本”。以及拙笔汉字“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十四”。同类纸质的包纸,库中保存有一批,从现有状态看,应为斯坦因在新疆停留,早期整理敦煌遗书时所用。从上述斯 05479 号包纸上的文字可知,该包纸原包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斯坦因的助手蒋孝琬曾经为之编号,并初步定名为“杂录书本”。包纸上其后的拙笔汉字“文心雕龙,第一至第十四”,或为翟林奈所写。但后来不知何故,馆方将该包纸改为包裹斯 05479 号。

二、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属于粘叶装

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被发现以后,很多研究者对它进行过研究,但大抵均为校注等,注重的是它的文献价值。笔者耳目所及,尚未见有人对它的装帧形式进行探讨。当然,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中简单谈及该《文心雕龙》的装帧,如林其铤、陈凤金在《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前言》中称“斯五四七八号原本蝴蝶装册页”。其实,该《文心雕龙》并非蝴蝶装,而为粘叶装。

粘叶装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后代失传,故人们对它不甚了了。笔者曾撰写《谈粘叶装》一文^①,首先考察了中国文献及历代学者对粘叶装的理解,指出直到宋代,粘叶装依然是受士大夫欢迎的书籍装帧法。但其后情况发生变化,自明末以来,以为粘叶装就是蝴蝶装的认识相对普及^②。文章又考察了日本书志学^③界的相关研究,指出由于将粘叶装、缝缀装、蝴蝶装混为一谈,使得日本学者对此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于是主张废止“蝴蝶装”这个名称,“凡是粘叶的,就叫‘粘叶装’;凡是线缀的,就叫‘缀叶装’”^④。

①此文原载《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 年增刊)。但因刊物篇幅限制,原稿文字被大幅度删节。后借出版《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的机会,恢复删节的文字,略加修订,收入该书。故以下引文均据《敦煌遗书散论》。

②方广钊:《敦煌遗书散论》,第 160-161 页。

③日本把书史、印刷史、目录学甚至图书馆、藏书家、藏书史等所有与书籍有关的研究,称为“书志学”。

④方广钊:《敦煌遗书散论》,第 164 页。

文章接着考察了蝴蝶装与粘叶装的不同形态,分别概括了蝴蝶装和粘叶装的基本特点^①,最后总结出蝴蝶装与粘叶装的同与异:

蝴蝶装与粘叶装,基本相同点是:

- 1、用浆糊粘接纸叶。
- 2、翻阅时,每纸之两边如蝶翅展开。

但也有不同之处,即:

- 1、蝴蝶装纸薄,单面抄写。粘叶装纸厚,可以双面抄写。

2、蝴蝶装用纸,必须对折。粘叶装可杂用不对折的单叶纸。虽然至今没有发现纯粹用单叶纸制成的粘叶装,但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的存在。

3、蝴蝶装因单面印刷,只要相邻两叶单口处不粘接,则翻阅时,有字、无字呈交错状。粘叶装不存在这种情况,每半叶都有字。

4、由于单面印刷,蝴蝶装可以用叶作编叶码的单位。粘叶装则必须用半叶作编叶码的单位。

- 5、蝴蝶装可能有相邻两叶书口处粘接及书耳。粘叶装没有。

6、蝴蝶装大抵为印本,粘叶装则为写本。(日本有印本粘叶装,这应该看作粘叶装在日本的发展。)

至于上述提到的粘叶装尺寸较小,书口处剪为圆形等等,有可能是敦煌遗书特有的,在此不作为粘叶装与蝴蝶装的本质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两相比较,粘叶装与蝴蝶装,不同之处要多于相同之处,不少区别是带有根本性的。因此,这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装帧方式,不应混淆。^②

很显然,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属于粘叶装。

三、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制作年代

粘叶装这种书籍装帧形式产生于中国,其后在汉文化圈流传。那么,它最早起源于什么时代?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钥匙。

1. 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抄写年代与这一粘叶装书籍制作年代的关系

严格地讲,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抄写年代与这一粘叶装书籍的制作年代的关系,存在如下两种可能:

第一,社会上当时已经流传有粘叶装书籍,《文心雕龙》按照社会流传的粘叶装书籍的规范抄写并制作,亦即其抄写年代即为其制作年代。

第二,社会上当时尚无粘叶装这种装帧形式,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原

^①方广钊:《敦煌遗书散论》,第 171、173-174 页。

^②方广钊:《敦煌遗书散论》,第 174-175 页。

为其他装帧形式,其后社会上出现粘叶装,斯 05478 号被后人改装为粘叶装书籍。

如果是上述第一种可能,由于抄写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时,社会上已经流传粘叶装,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抄写年代自然可以视为中国粘叶装书籍出现的下限。

如果是上述第二种可能,那么需要考察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最初是用什么装帧形式制作的,现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是否由那种装帧形式改装而成。

在此着重讨论第二种可能,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是否由其他装帧形式改装而成。

如果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最初抄写时采用其他装帧形式,其后改为粘叶装。那么,它由哪一种装帧形式改装为粘叶装?

在此,首先应该考虑的自然是卷轴装,因为卷轴装是当时最为流通的装帧形式。但卷轴装的抄写方式为:同一文献一般单面连续抄写,如果单面抄写不下,又不想续接纸,则必然是抄到卷尾以后,翻过来从背面接抄,正背两面文字相续。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不符合这一特点,所以它不可能由卷轴装改装。

那么,它是否有可能由经折装改装?由于经折装的抄写方式与卷轴装相同,所以,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后代有人把经折装改为卷轴装,也有人把卷轴装改为经折装。但正因为经折装的抄写方式与卷轴装相同,所以经折装也无法改装为粘叶装。

不少缝缀装书籍的长度与宽度与粘叶装大体相同,且两者都是小册子。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有无可能由缝缀装改装而成?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第一,缝缀装每个单元包括几张纸,其中每张纸抄写的文献内容,除了芯纸 4 个半叶的文字可以相连外,其余诸纸均为同叶 2 个半叶的文字可以相连,与同纸另 1 叶 2 个半叶所抄写文字不能相连。关于缝缀装的这一特点,可以参见拙作《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①。所以,缝缀装如果要改装为粘叶装,除非把原缝缀装中除芯纸以外的其他诸纸,从原来的 1 纸 2 叶 4 个半叶一律裁开成为 2 纸 2 叶 4 个半叶。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缝缀装可以改装为粘叶装,但改装后的粘叶装必然大部分都是单叶纸,中间有规律地出现若干双叶纸(即原芯纸),不可能全部都是双叶纸。但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除了首尾残断为单叶纸外,其余均为双叶纸。第二,若无特殊情况,缝缀装每半叶抄写行数大体相等,而粘叶装因为需要留下前后粘接的接缝,同一叶两个半叶的行数往往差一行。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正好符合粘叶装的这一特点。第三,缝缀

^①方广钊:《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藏外佛教文献》第七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第 372 页。但该文将“缝缀装”称为“缝绩装”。且方塔出土缝缀装为双层折叠薄纸,有自己的特点。

装每行抄写均匀,有的会抄写到叶边。如果改为粘叶装,则粘接处将会显得局促,空间不够,甚至压掉所抄文字。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无此种现象。第四,缝缀装用针线缝缀,原件会留有针孔。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上无针孔。总之,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不可能由缝缀装改装。

梵夹装形态特殊,每叶均留有一个或两个穿线的孔洞。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卷面无这些孔洞,显然也不可能由梵夹装改装。

至于旋风装、棍夹装等等,目前书史学界对其形制尚在讨论中,笔者亦将依据现有实物对这两种装帧方式进行论述,此处不赘。总之,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并非,亦不可能由旋风装、棍夹装改装而成。

上面的简单考察,完全否定了上述两种可能中的第二种可能,亦即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并非原为中国古籍中的其他装帧形式,其后改装为粘叶装。于是只剩下第一种可能: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从诞生起,就是一部用标准的粘叶装规范抄写并制作的书籍。所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抄写年代应该等同它的制作年代。

退一步,就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而言,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不排除该书抄写以后,放置若干年,然后将诸纸一一顺次粘接,制作为可以阅读的书籍。即使如此,由于它的抄写方式完全按照标准的粘叶装规范进行,说明抄写此书时,粘叶装书籍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其书写规范,已经被人们了解。因此,我们依然可以说该《文心雕龙》的抄写年代体现了中国粘叶装书籍出现的下限。

2. 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抄写年代

林其铨、陈凤金的《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汇总、介绍了学术界关于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抄写年代的各种观点,简述如下:

赵万里从该写本中“渊”、“世”、“民”等三字避讳及书法笔势,推断它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杨明照据“渊”、“世”、“民”等三字避讳,《铭箴篇》中“张昶”误为“张旭”,推断该写本“当出玄宗以后人手”,但提出写本中“照”字不避讳这一疑问;姜亮夫依据赵万里推论,主张该《文心雕龙》或为唐大中七年所写;日本铃木虎雄则主张是“唐末钞本”^①。

林其铨、陈凤金两位指出: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避“渊”、“世”、“民”讳,不避“忠”(唐高宗太子李忠)、“弘”(高宗太子李弘)、“照”(武后武曌)、“显”(中宗李显)、“豫”(代宗李豫)。他们认为,写本中的“治”(高宗李治)虽写作“冶”,但引杨明照校语,主张系误写,而非避讳。“旦”(睿宗李旦)虽缺笔作“ㄣ”,但史讳有改“旦”作“明”,无缺笔作“ㄣ”之例,故亦不认为是避讳。综合上述资料,林其铨、陈凤金两位主张:“此卷书写时间至迟当不晚于开、天之世,有很大可能殆出初唐人手。”^②

①林其铨、陈凤金集校:《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前言》,第9页。

②林其铨、陈凤金集校:《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前言》,第9页。

笔者以为,林其铨、陈凤金两位的观点基本正确,惜夫缺乏进一步的深入考订。

如上所述,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所用纸张为打纸,厚薄均匀,厚度约 0.1 毫米。无帘纹。这种纸张,在敦煌遗书中集中出现在公元七至八世纪。该写本的字体基本上可判为行书,但也有若干字接近章草。从写本总体风格看,亦属于公元七、八世纪。因此,如果单纯从该写本的现存形态看,可以基本判定为公元七、八世纪的唐写本。

当然,依据纸张与写本风格,仅可大致断代。在此,对该《文心雕龙》中的避讳情况再作考察。

在此,先将研究该《文心雕龙》避讳时可能涉及的唐代诸帝名讳及生卒年、在位年等情况,按照诸帝在位的先后次序表列如下(不包括李渊父亲李虎,因该《文心雕龙》中无“虎”字,无考察价值):

表一:诸帝名讳、生卒年、在位年

庙号	姓名	生卒年	在位年
高祖	李渊	566 年-635 年	618 年-626 年
太宗	李世民	599 年-649 年	626 年-649 年
高宗	李治	628 年-683 年	649 年-683 年
中宗	李显	656 年-710 年	684 年
睿宗	李旦	662 年-716 年	684 年-690 年
则天顺圣皇后	武曌(照)	624 年-705 年	690 年-705 年
中宗(重祚)	李显	656 年-710 年	705 年-710 年
少帝(殇帝)	李重茂	694 年-?	710 年
睿宗(重祚)	李旦	662 年-716 年	710 年-712 年
玄宗	李隆基	685 年-762 年	712 年-756 年

表一未列入高宗太子李忠、李弘,但列入少帝(殇帝)李重茂。因为李重茂虽然在位仅一个月即被废,但按照传统史观,仍属正统。

下面,笔者在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中逐一查核上述诸帝名讳,共得 55 字。今将该 55 字的情况表列如下:

表二:敦煌本《文心雕龙》避讳字表

说明:

- 1.“序号”指该字在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中出现的次序。
- 2.“半叶/行字”指该字出现在该《文心雕龙》中的第几个半叶、第几行,为第几个字。
- 3.“本字”指诸帝名讳中需要避讳的字。其后的数字指该字在该《文心雕龙》中出现的先后次序。
- 4.“敦煌遗书字”指斯 05478 号写卷中该字该次出现的字形,用图形表示。
- 5.“重讳者”,指“敦煌遗书字”与“本字”的避讳关系。
- 6.“避讳法”,著录该字是否避讳。如为避讳,说明避讳方法。

序号	半叶/行/字	本字	敦煌遗书字	重讳者	避讳法
01	01/01/10	民-01	𠂔	李世民	缺笔
02	01/05/11	世-01	世	李世民	缺笔
03	02/01/18	重-01	重	李重茂	不避
04	02/05/09	显-01	𠂔	李显	不避
05	03/10/08	世-02	世	李世民	缺笔
06	03/10/15	重-02	重	李重茂	不避
07	04/04/13	重-03	重	李重茂	不避
08	04/06/21	渊-01	𠂔	李渊	缺笔
09	04/09/01	照-01	照	武曌(照)	不避
10	04/11/05	显-02	𠂔	李显	不避
11	05/01/17	显-03	𠂔	李显	不避
12	05/04/14	茂-01	茂	李重茂	不避
13	06/07/09	渊-02	𠂔	李渊	缺笔
14	06/09/09	显-04	𠂔	李显	不避
15	07/01/01	世-03	世	李世民	缺笔
16	07/04/15	显-05	𠂔	李显	不避
17	07/04/16	世-04	世	李世民	缺笔
18	07/06/01	世-05	世	李世民	缺笔
19	08/05/10	世-06	世	李世民	缺笔
20	09/02/17	世-07	世	李世民	缺笔
21	10/03/18	世-08	世	李世民	缺笔
22	10/09/06	重-04	重	李重茂	不避
23	10/10/11	隆-01	隆	李隆基	不避
24	12/09/05	渊-03	𠂔	李渊	缺笔
25	14/06/19	世-09	世	李世民	缺笔
26	15/07/02	世-10	世	李世民	缺笔
27	16/03/12	世-11	世	李世民	缺笔
28	16/06/15	茂-02	茂	李重茂	不避
29	17/01/07	民-02	𠂔	李世民	缺笔
30	17/01/18	世-12	世	李世民	缺笔
31	19/02/09	世-13	世	李世民	缺笔
32	20/05/10	世-14	世	李世民	缺笔
33	21/08/15	世-15	世	李世民	缺笔

(续表)

序号	半叶/行/字	本字	敦煌遗书字	重讳者	避讳法
34	21/11/06	世-16	世	李世民	缺笔
35	22/09/17	渊-04	渊	李渊	缺笔
36	24/05/04	世-17	世	李世民	缺笔
37	24/07/19	旦-01	旦	李旦	缺笔
38	24/09/16	民-03	民	李世民	缺笔
39	24/10/09	民-04	民	李世民	缺笔
40	25/02/20	世-18	世	李世民	缺笔
41	25/04/04	显-06	显	李显	不避
42	25/05/11	显-07	显	李显	不避
43	25/11/06	显-08	显	李显	不避
44	26/04/05	重-05	重	李重茂	不避
45	26/08/09	治-01	治	李治	缺笔
46	27/04/07	旦-02	旦	李旦	缺笔
47	27/07/05	民-05	民	李世民	缺笔
48	27/10/21	民-06	民	李世民	缺笔
49	33/03/17	民-07	人	李世民	换字
50	34/08/02	世-19	世	李世民	缺笔
51	35/04/07	世-20	世	李世民	缺笔
52	39/10/09	民-08	民	李世民	缺笔
53	40/01/12	民-09	民	李世民	缺笔
54	40/05/09	世-21	世	李世民	缺笔
55	42/09/14	渊-05	渊	李渊	缺笔

从上表可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中与表一中诸帝名讳相符,有可能需要避讳者,共 55 字。这 55 字的具体情况如下:

“渊”,五字,均避。缺笔。

“世”,二十一字,均避。缺笔。

“民”,九字,均避。缺笔,八字;换字,一字。

“治”,一字,避讳。缺笔。

“显”,八字,均不避。

“旦”,二字,均避。缺笔。

“照”,一字,不避。

“重”,五字,均不避。

“茂”,二字,均不避。

“隆”,一字,不避。

说明:“李隆基”之“基”,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中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林其铨、陈凤金两位注意到该《文心雕龙》写本中“治”(高宗李治)虽缺笔作“冶”,但引杨明照校语,认为此属误写,而非避讳。“旦”(睿宗李旦)虽缺笔作“𠂔”,但认为史讳有改“旦”作“明”,无缺笔作“𠂔”之例,故亦不认为属于避讳。但我认为“冶”、“𠂔”两字为“治”(高宗李治)、“旦”(睿宗李旦)的缺笔避讳字。

对照表一与表二,可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抄写年代应为睿宗李旦时期。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旦曾先后两次登基,第一次在 684-690 年,第二次在 710-712 年。该《文心雕龙》抄写于睿宗的哪一次登基呢?我认为应该是第一次,即抄写于 684-690 年。因此,该《文心雕龙》不避“照”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中宗李显是睿宗李旦的哥哥,亦曾先后两次登基,分别为 684 年、705-710 年。睿宗两次登基均在中宗之后,而该《文心雕龙》不避中宗讳“显”,应如何解释?

我认为,由于中宗第一次登基不久,旋被武则天所废。中宗既已属废帝,自然不需避其名讳(我们在唐代的写本中没有发现过避“重”、“茂”之讳者,原因也在这里。当然,如果某写本恰好抄写于李重茂在位时,想必会避其讳。只是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样的写本)。这也是该《文心雕龙》抄于 684-690 年的理由之一。因为如果抄于睿宗第二次登基的 710-712 年,则中宗属于被弑,理应避讳。

中宗原名“李哲”,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中“哲”字凡五见,分别为 01/0317、030416、050617、1011/20、250907,均不避讳。因中宗其后已改名为“李显”,故上表中不列“哲”字。

上述对《文心雕龙》避讳字的考察与对原件纸张与写本风格的考察完全吻合^①。因此,我们可以判定,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抄写于唐睿宗第一次登基时期,亦即从公元 684 年到 690 年这 6 年中。由此,中国书籍中的粘叶装,最迟在公元七世纪末已经出现,而该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是我们现知的时代最早的粘叶装书籍。

四、余论

敦煌遗书中卷轴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缀装、梵夹装、旋风装、棍夹装及其他一些尚待研究的书籍装帧形式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古代中国书籍装帧史的认识。在此,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书籍装帧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种种丰富多彩的形态?其内在的动力何在?

论者或谓上述粘叶装、缝缀装等多种形态的出现,所反映的实际是中国书

^①利用避讳字考察写本的抄写年代,需要注意其研究对象。如佛教文献往往不避讳,或不严格避讳,故不能用佛教文献来进行这种研究。

籍从卷轴装向线装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出现了若干不定型的非典型装帧形态。经过这一过渡时期的反复试验,人们终于淘汰诸非典型装帧形式,认可线装。并把这一过渡时期定为晚唐五代。

斯 05478 号《文心雕龙》的出现,说明粘叶装最迟在七世纪末已经出现。由于该斯 05478 号制作规整,抄写规整,完全是成熟期的作品,故粘叶装的最初发轫无疑应该更早。笔者在《敦煌遗书斯 05665 号与经折装》一文中已经指出,早在唐高宗时期,经折装已经成熟^①。又,敦煌遗书中的缝缀装,其年代最早的实物可追溯到八世纪。也就是说,到晚唐五代这些装帧形态在中国至少流传了三百年。因此,用“过渡时期”的不定型非典型性形态来解释上述装帧形态的出现,恐怕还值得斟酌。

笔者认为,由于初唐以来的社会安定、文化大发展,引发社会上文化学习普及,书籍需求量增大,加之外来佛教典籍装帧形式的影响,由此使得中国书籍装帧形态出现如此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书籍装帧的演变还与因造纸技术及纸张加工工艺的演化而产生的纸张的变化、与书籍制作的不同方式(抄写或印刷)息息相关。由此,探讨书籍装帧的演变原因,牵涉面比较广,容后另找机会进行。

【作者简介】方广锬,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佛教。

^① 方广锬:《敦煌遗书斯 05665 号与经折装》,《文史》2005 年第 1 辑。